

澳大利亚媒体在“中国影响”报道中的角色定位

张桂芳

摘要: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社会出现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其中在澳大利亚体现为“中国影响论”。基于对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影响”报道的分析发现,尽管澳大利亚媒体宣称是独立的,但在涉及“中国影响”的报道中并未履行其看门狗角色,在议程设置与消息来源的使用上均保持与政府的密切互动,对来自对立群体和国家的观点则予以削弱或解构。与政府的态度相比,媒体甚至在“中国影响”议题上的态度更为激进。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之下,澳大利亚媒体将自己设定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但这一角色是通过建构一个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并将中国“他者化”来实现的。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的内在框架继而影响到公共辩论的视角与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导致整个公共话语的失衡,加深了公众对中国的消极认知。该案例表明,无论媒体是否独立于本国的政党和政府,都难以超越国家利益而以中立的立场组织报道。此外,该案例还挑战了全球化与传播技术会改变国际报道中的偏见的观点,因为这种偏见的存在源自媒体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对外部环境的无知。

关键词:澳大利亚媒体;中国影响;看门狗角色;中澳关系;媒体偏见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0)03-0117-12

项目基金: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8CWYJ15)

一、引言

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社会开始出现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但正如史安斌所指出的,“此次‘锐实力’之争与以往渲染中国对西方大国和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威胁’不同,更多聚焦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希腊等西方中小国家,拉美、中东欧等地区的‘脆弱民主政体’和海外华人群体。”^[1]其中,在澳大利亚具体表现为“中国影响论”。

“中国威胁论”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中国被视为威胁未来世界秩序与美国霸主地位的主要来源,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于1992年之后在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密集出现,^[2]之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人的进一步阐发和推动下,成为美国制定遏制中国战略的理论基础。“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在于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成了外部挑战。基于中国国力增强的事实,这种论调逐渐扩散开来。在“中国威胁论”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视中国为威胁的舆论现象出现,这些舆论现象因为发生的具体时段与具体国家不同,具体原因和诉求也各不相同,但都被称之为新“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威胁论”的变种,^[3]以至“中国威胁论”这一概念外延不断扩大,内涵则不断被稀释,很难体现出具体舆论现象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新一轮涉华舆论,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新的“中国威胁论”,但本轮涉华舆论关注点除了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之外,更关注中国在政治、教育、文化、媒体等方面对澳大利亚内部的影响,具有与以往“中国威胁论”不同的特征,况且舆论内部也并不统一。此外,在澳大利亚公共话语中,与本轮涉华舆论相伴随被频繁使用的

一个词语是“中国影响”,在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中,关于“中国影响”的报道数量自2017年起出现明显攀升(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 数据库所有媒体来源的“中国影响”报道数量分别为2015年54篇、2016年67篇、2017年123篇、2018年263篇),并远超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数量(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 数据库所有媒体来源的“中国威胁”报道数量分别为2015年39篇、2016年34篇、2017年51篇、2018年45篇),如图1所示;在澳大利亚官方话语与机构民调中也用“中国影响”而不是“中国威胁”来指代舆论关注的内容。因此,为了强调澳大利亚近年来涉华舆论的独特性,用“中国影响论”这一概念来指称更为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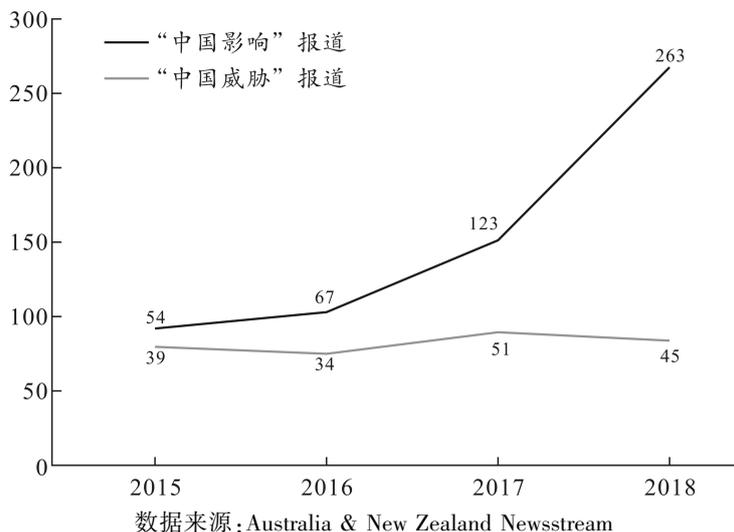


图1 澳大利亚媒体“中国影响”与“中国威胁”报道量对比(2015年1月—2018年10月)

目前,有学者从国际关系的层面对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影响论”做了宏观的分析,认为是当下国际体系深刻变革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震荡调整两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反映了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普遍忧虑和防范情绪。^[4]也有学者对澳大利亚涉华舆论走向进行了总结与预测,认为“整体向好、曲折多变”。^[5]基于国际关系框架的分析为理解国际上的涉华舆论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提供了参考,但却难以充分解释“中国影响”话语是如何在澳大利亚产生、传播、成为主导性公共话语的。因此,本文聚焦于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影响”的报道,从媒体的角度呈现“中国影响”话语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进而探讨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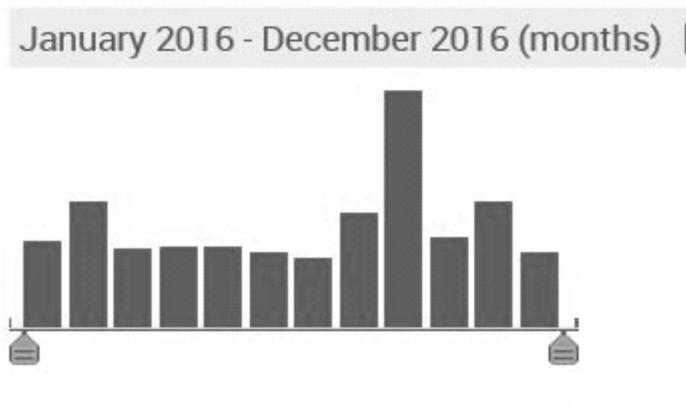
媒体的角色通常是由特定的媒介体制所决定的,人们通常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Hallin 和 Mancini 基于对18个西欧和北美国家的调查,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媒介体制发展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民主法团主义和自由主义,用以解释为什么媒体在不同的体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顺便提到澳大利亚或许可被视为自由主义模式的另一个例子。^[6]自由主义模式流行于英国、爱尔兰和北美,所有这些国家都有对公共广播进行政治隔离的传统,同时在这些国家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得也比较充分。在自由主义媒介体制下,媒体被赋予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担当着看门狗的角色,对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进行监督。但这样的媒体角色一般是从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来界定的,媒体面对的是与政府、政党、商业组织等的关系,当媒体进行国际报道时,则超越了既定媒介体制内的角色,媒体面对的是与本国及他国的关系。在报道国际事务时,媒体是否仍然能够承担看门狗角色呢? Bennett 基于对美国新闻的研究发现,“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官方主导的程度往往更高,反对派团体和其他国家的观点往往被推到边缘。”^[7] Tiffen 也认为,与其他冲突的新闻报道相比,在对国际冲突的新闻报道中一直存在更多的偏见与种族中心主义,并且国际报道往往是国内政治争议和议程的延伸,允许政府利益和前

景占主导地位。^[8]但东尼·凯伊认为在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媒体拥有独立的编辑部,“媒体对政府以及商业机构通常都采取质疑的态度进行报道,而这种传统不仅应用于国内报道,也用在了国际新闻的报道上。”^[9]那么,澳大利亚媒体在对“中国影响”的报道中究竟持有何种角色立场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将不仅有助于理解自由主义媒介体制下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角色,也有助于理解西方媒体在涉华舆论中的作用。

本文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新闻集团(News Corp)、费尔法斯克媒体公司(Fairfax Media)旗下媒体的“中国影响”报道为研究对象。ABC是澳大利亚的公共媒体公司,由政府资助,但政府并不能干涉其媒体编辑方针与具体内容制作,News Corp与Fairfax Media为私人媒体公司,从理论上而言,三家媒体公司都具有独立的地位。但随着党派政治的不稳定与党派间冲突的加剧,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出现,主流媒体对政治冲突的报道也卷入政治纷争,其中立性与客观性遭遇质疑:ABC与Fairfax Media被指责充满左翼自由主义偏见,News Corp被认为支持政治保守派。无论是从媒体性质还是媒体政治倾向来说,以这三家媒体公司的媒体报道作为分析对象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澳大利亚媒体的立场和角色。

选取研究样本的方法为:在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数据库搜索关键词China influence,时间跨度设定为2016年9月至2018年10月(起始时间的设定是因为在按月度搜索近四年的相关报道时发现,2016年9月份起出现了第一个小高峰,之后的研究表明这个报道高峰与政治议程高度关联,如图2所示),筛选条件设定为News Corp OR Fairfax Media OR ABC Inc,分别获得News Corp媒体报道20篇,Fairfax Media媒体报道298篇,ABC媒体报道16篇。鉴于来自News Corp与ABC的媒体报道偏少,又在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数据库将筛选条件设定为The Australian(澳大利亚人报)获得89篇报道(The Australian为News Corp旗下主要媒体,在设定News Corp为筛选条件的搜索结果中也包含The Australian的报道,但在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数据库中,News Corp与The Australian在筛选条件中分别列出),在ABC网站搜索获得52篇报道,如表1所示。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些报道样本并非为了做定量研究,而是为了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认知,以保证定性研究的可靠性。

本文将从议程、信源、立场、框架等层面对所选取的报道进行定性分析,即在对报道样本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重点对引发广泛影响的标志性报道进行文本细读与深度分析,借助报道文本中隐含的意义与文本间的联系,来呈现媒体议程与政治议程的关系、媒体与官方信源的关系、媒体的立场、报道框架及对公众的影响,并最终揭示出澳大利亚媒体在“中国影响”报道中的角色定位。



资料来源: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数据库搜索结果截图

图2 “中国影响”2016年报道量月度分布

表1 本文选取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影响”报道的样本数量及数据来源

媒体公司	报道数量	数据来源
News Corp	20	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设定筛选条件为 News Corp)
	89	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设定筛选条件为 The Australian)
Fairfax Media	298	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
ABC	16	Australia & New Zealand Newsstream
	52	ABC 网站

二、“中国影响”的媒体议程与政治议程

纵观所研究时段内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影响”的报道,媒体议程与政治议程存在高度关联。这种关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媒体紧跟政治议程,将政治议程转换为媒体议程;二是媒体议程与政治议程并行发展,几乎同时展开相似的议题;三是媒体议程作用于政治议程,推动政治议程。

首先,媒体报道紧跟政治议程,将政治议程呈现为媒体议程。澳大利亚时任总理 Turnbull 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介绍《国家安全法修正案(间谍和外国干涉)2017》时说,“去年 8 月,当我通过我的部门就此提出一份报告时,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调查突破,并发出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警告。”^[10]这也就是说 2016 年 8 月澳政府开始将“中国影响”提上政治议程。而媒体对“中国影响”的报道在 2016 年 9 月份出现显著增长,媒体的主要议题为在澳华商的政治捐赠对澳政治的影响,议题的焦点在澳工党议员 Dastyari 要求并接受华商捐赠的行为。自此后,对“中国影响”的报道成为媒体的重头戏,随着澳大利亚 2017 外交白皮书的发布,以及澳政府将数个遏制外国影响和间谍行为的法案提交议会讨论,媒体紧跟政治议题对与中国有关系的个人、群体、组织、公司甚至产品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审查式的报道。

其二,媒体议程与政治议程并行发展。根据澳时任总检察长 Brandis 在 ABC 的一则新闻报道中所说,2017 年初,时任总理开始全面评估澳大利亚的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法。^[11]几乎在同一时间,ABC 的四角栏目开始制作其调查报道《权力与影响:中国软实力的硬边缘》。该报道于 2017 年 6 月 5 日播出的时候,ABC 声称该报道制作周期长达 5 个月。^[12]从时间来看,政府与媒体针对“中国影响”的行动并行展开。到了 2017 年 6 月 3 日,Turnbull 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区域安全对话时,在主旨演讲中提到关于中国的“一些恐惧”和“黑暗的观点”^[13];在澳大利亚本土,Fairfax 与 ABC 四角栏目关于“中国影响”的联合系列报道出炉,包括上面所提及的《权力与影响:中国软实力的硬边缘》,无论是政策制定、公共辩论还是学术探讨,该系列报道成为在涉及“中国影响”时均无法绕开的媒体报道;与此同时,时任总检察长 Brandis 宣布对内阁进行立法改革以期在年底前出台相关法律。^[11]媒体议题与政府议题再次并行展开。

其三,媒体议程作用于政治议程,推动政治议程。时任总理 Turnbull 在介绍《国家安全法修正案(间谍和外国干涉)2017》的时候明确将媒体的报道作为出台新法案的依据,他说:“媒体报道称,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暗中干涉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大学,甚至干涉这座大楼里民选代表的决定。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报道”^[8]。学者 Head 和 Byrne 也指出,媒体对“中国影响”的报道推动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白皮书和新的外国干涉法案的出台。^[14-15]

由以上分析可见,有关“中国影响”的媒体议程一直保持与政治议程的同步与密切互动,这引出的问题是:这种同步与互动是如何形成的呢?

三、“中国影响”报道对官方信源的运用

尽管澳大利亚媒体被赋予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在“中国影响”报道中,媒体却让官方信源主导

了媒体议程,这里的官方信源既包括具名官方信源也包括匿名官方信源。然而,“让官员们制定新闻议程,不仅让他们在公众想什么和怎样想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且使他们能够运用策略性的传播技巧形塑现实”^[7]。正是经由官方信源这一中介环节,“中国影响”话语由政治议程进入媒体议程并进而反作用于政治议程。

(一) 报道中的具名官方信源

在对“中国影响”的报道中,具名官方信源被媒体视作权威信源,或者就其他来源的信息进行回应,或者提供报道的核心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名官方信源具有清晰的引导公共舆论的意图,并实际上借助媒体推动了政府行动。比如,工党参议员 Dastyari 要求一位在澳华商为他代付旅行账单一事被媒体报道后,针对该事件,媒体采访了时任总检察长、总理与财政部部长,寻求他们的看法。这些政府批评者并没有指责 Dastyari 违反任何规则或法律,而是将重点放在他接受华商的礼物和捐款与他关于中国南海的言论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上。时任总检察长 Brandis 表示,Dastyari 接受外国捐赠的个人资金使他处于接受“外国实体的报酬”的位置,并质疑这导致他对外交政策采取不同的立场。^[16]时任总理 Turnbull 认为这种情况属于“现金交换评论”。而当时的财政部长 Morrison 则将 Dastyari 贴上“上海山姆”的标签。^[17]显然,政府官员们的观点将报道与舆论的方向从个人行为的不当转向了一个更大的主题——“中国影响”。

再比如,在 ABC 四角栏目与 Fairfax 媒体关于“中国影响”的系列报道中,具名官方信源同样被用来回应其他来源的信息,其回应借机表明了政府下一步的行动。以该系列报道之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的目标是共产党与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联系》为例,报道的核心信息是一份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调查文件的内容,从报道文本来看,尽管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试图发现中国共产党与在澳华商政治捐款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假设。当记者从具名的官员处寻求评论和回应的时候,这些官员只谈论间谍与外国渗透的国际形势,并没有明确指向北京或肯定信息的真实性,却表示政府会对此采取行动。在报道的结尾,“Turnbull 政府”回应:“不只是倾听警告,而且采取行动”;时任总检察长 Brandis 表示将出台新的法律以“加强我们的机构调查、起诉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行为的能力”。^[18]这样的表态为之后的政府行动提供了铺垫。当 2017 年 12 月份澳政府推出了间谍与外国干涉法案时,时任总理 Turnbull 专门强调了媒体报道是出台新法案的依据。^[10]这表明,借助媒体的报道,具名官方信源前期的表态与后期的行动形成了呼应。

如果说在早期的相关报道中,具名官方信源主要被用来回应其他来源的信息的话,那么自 2017 年 12 份之后,具名官方信源则成为重要的核心信息提供者。以时任总理 Turnbull 为主的政府具名官员对新法案的解读以及对“中国影响”的种种说法,构成了之后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

(二) 报道中的匿名官方信源

媒体对“中国影响”的报道,一直都伴随着匿名官方信源的爆料。上文提及的报道《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的目标是共产党与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联系》,其核心信息即来自匿名的“八个官方信源”,这篇报道在描述这些匿名官方信源时还使用了“看过这个文件的一些人”“知道三人被告知内容的信源”“另一个政治人物”“一位移民部的发言人”和“一位官员”等说法。匿名官方信源在透露文件内容的同时,传递了一种无可置疑的信任,这篇报道写道:“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渗透澳大利亚政界和外交界,并对澳大利亚不断增长的中国人口获得更多的影响力。”而这种坚信构成了报道的基调。尽管在这篇报道中,非官方信源提供了多样化的观点,但他们只起到辅助的作用,对报道的基调未产生实质的影响。其他的报道如《陆克文、捐赠人在中国会面》使用了匿名信源“资深澳大利亚外交官”^[17];《政府需要“非常清楚”外国对澳大利亚大学的干涉,安全情报组织说》使用了匿名信源“澳大利亚政府官员”^[20];《中国的软实力:Julie Bishop 就共产党的言论向大学生发出警告》使用了匿名信源“一位资深外交官员”^[21];《澳安全情报组织标记满洲候选人》使用了匿名信源“安全官员”^[22];《Robb 的秘密中国合同:独家》来自“一封密信”,此外还使用了匿名信源

“一位政府官员”^[23]；《Dastyari 南中国海言论的录音带曝光》则没有标明任何信源，只说“Fairfax 媒体已经证实”^[24]。

匿名信源的使用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使用匿名信源，就无法获得真相，实现监督权力的功能，如果信源因提供真相而面临危险，记者有责任通过匿名方式保护信源；反对者则认为如果信源不具名就很难判断其可靠性和中立性，而记者有责任向公众提供完整的信源信息。从匿名信源的实践来看，匿名信源可以帮助记者揭露一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重大新闻，比如《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但是它们并不总是以这种方式被使用，在某些情况下，匿名信源可能被用来提供不确定或虚假的信息；有的是记者造假，比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均出现过利用匿名信源进行新闻造假的案例；有的是信源造假，比如《纽约时报》对伊拉克铝管的报道。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们可能被用来攻击政敌或将观点作为事实提出以操纵舆论，比如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匿名信源的运用使得新闻基调将战争表现得更加积极和不可避免，因此，在 Hatcher 看来，匿名信源是政客而非记者的有效工具。^[25]

在该案例中，大量匿名官方信源的使用，使得报道的可信性与中立性令人怀疑。前贸易部长 Robb 对关于他与中关系报道就表示，“试图在某些方面破坏我的声誉是不明智和廉价的政治，现在这种图谋正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怂恿”^[23]。新南威尔士州工党领袖 Foley 也指责 Fairfax 媒体报道对中国出生的工党议员 Wong 和其他华裔澳大利亚人进行“抹黑和暗示”。^[26] Laurenceson 教授则审查了媒体报道中指控中国影响澳大利亚的代表性说法，发现这些说法均背离了事实基础。^[27]此外，澳大利亚近几年通过一系列与国家安全、监控有关的法律，这些法律几乎没有对揭发者进行保护，不管他们是否证明代表了公共利益。根据这些法律，绝大部分的泄密行为都可以被定罪。其中，现任、前任联邦官员甚至议会成员对官方秘密的传播均属有罪的泄密行为。而对于泄密者，澳大利亚学者认为在数字时代通过源数据、GPS 数据、闭路电视和电话数据很容易找到，在 Kessing 向媒体揭发海关部门腐败的案子中，Kessing 就是通过源数据被找到并被定罪的。^[28]在该案例中，匿名官方信源的使用似乎可以视为对信源的保护，但如果涉及泄露的是官方秘密，即便是匿名也会受到追查，譬如 Kessing 所遭遇的，如果没有涉及秘密，那信源就不存在安全风险也没有匿名的必要。显然，这些匿名信源并没有被视为泄密并被追查，那么匿名的使用反过来说明要么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存在问题要么信源的动机存在问题。尽管这些充满匿名指控的报道存在问题，却不妨碍澳大利亚政府依据这些报道出台新的法案。

匿名官方信源持续爆料，具名官方信源回应爆料、引导舆论、提供政府行动信息，两类官方信源联手使得政治议程成功地转化为媒体议程，并借助媒体报道推动了政治议程。但这只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吗？

四、激进的媒体立场

澳大利亚媒体与政府总是声称媒体是独立的，但在对“中国影响”的报道中，媒体本该质疑的时候却选择了认同。Bennett 和 Serrin 认为媒体报道某些重要事件的时候并不总是能扮演看门狗的角色：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媒体没有做到挑战权威的说法，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媒体屈服于记者-信源的交换。^[29]然而在该案例中，与以上两种情况不同，媒体显示了对信源与政治议程清醒的认知，是否与政府步调一致很大程度上是媒体自主选择的结果。

首先，媒体对官方信源尤其是匿名官方信源有着清醒的认知。媒体很清楚匿名信源动机的复杂性，澳大利亚特别广播(SBS)与悉尼先驱晨报的前记者 Munro(她也作为记者参与了有关“中国影响”的报道)在谈到关于“中国影响”的媒体报道时说：“是的，我是记者，所以我要这么说，我知道这是一项有限的和不完美的手艺，当一些报道的消息来源不会记录在案时，情况尤其复杂”^[30]。然而，媒体仍然选择使用、信任并认同这些匿名官方信源的观点和立场。媒体同样明白官方的目的并不像

它所声称的仅仅为了国家的利益,一些报道和评论揭示了官员的指控与竞选及党派利益密切相关,但媒体同样仍然选择认同官方的说法。以相关报道的标题为例,官方信源的观点常常被制作成标题,甚至有些时候直接使用信源的观点做标题而并不标注信源,比如,ABC 的报道《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威胁的澳大利亚主权》,^[31]《悉尼先锋晨报》的报道《中国影响进入州议会》,^[32]《澳大利亚人》的报道《中国“试图让我们的政治格局向它的利益倾斜”》等等。^[33]标题不只代表着官方信源的立场同时也代表着媒体的立场,尤其当标题并不标注信源时。

其二,媒体选择性认同官方立场。媒体对官方立场的认同并非始终如一,与官方立场相比,媒体立场更为激进。当官方对华强硬时媒体议程紧跟政治议程,且延伸并强化了政治议题,但当官方对华态度转变时,媒体却选择忽略。在政府针对所谓的外国影响出台新的法案后,媒体认为“政策变化不可能结束对中国影响的担忧”,新闻应该作为“在这场必要的斗争里面的有魔力的武器”,^[30]媒体的工作就是去“审查亲北京的网络”,“澳大利亚新闻编辑室需要加强对中国在土地交易、大学资助、政党和智库方面的影响以及试图恐吓中国留学生和生活在这儿的中国公民的调查”。^[34]当政府开始软化曾经在处理中澳关系时所用的尖锐措辞,并改变关于中国崛起、南中国海、国际学生、中澳研究合作、华裔移民的腔调时,媒体却依旧不断报道关于“中国影响”的新故事。当新任总理 Morrison 在华人社区发表对华友好演讲后,其演讲稿在澳大利亚华语媒体、中国媒体、中文社交媒体以及澳大利亚观察者与研究者圈子广泛传播,主流英语媒体则只有新闻集团发表了一则简讯,其他主流媒体集体选择忽略,而新闻集团的这则简讯标题被新闻学者解读为“有些愤世嫉俗(somewhat cynical)”。^[35]

其三,媒体选择性引用不同来源的观点。在对待反对派与外国观点时,澳大利亚媒体在“中国影响”报道中也并未给予平等对待。尽管反对派的观点在媒体评论中有所反映,但很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即便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亦没有主导报道的基调。更经常的是反对群体被打上“亲北京”的标签变成媒体审查的目标。有时记者甚至直接以评论的形式对反对派的观点进行驳斥。^[36]在关于“中国影响”的报道中,除了国内不同派别的观点,也有来自美国与中国的观点。对待两国的观点,媒体同样采取了差别性对待,来自美国的观点被媒体毫不怀疑地认可并加以报道,正如 Fitzgerald 所说,媒体大多时候都在贩卖未经处理的堪培拉政客与美国智库的爆料。^[37]对于来自中国的观点则总是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反驳或者解构。^[38]该案例验证了 Bennett 和 Tiffen 关于国际报道中存在偏见的观点。但 Tiffen 认为国际报道的这些特点源于受众和信源均来自矛盾的一方,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已经显著改变了国际报道中对另一方孤立和无知的主导模式,^[8]该案例则表明国际报道中媒体偏见改观的程度并不理想。

五、二元对立的报道框架及其对公众认知的影响

(一) 报道框架的建构

在“中国影响”报道中,媒体借助官方信源之口使用了诸多宏大修辞,比如“爱国主义”“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完整性”“国家价值观”等,建构了一个“威胁”与“保护”的民族主义叙事。Gyngell 在其文章中说,有证据表明,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更加强烈,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全球化精神正在退却。^[39]McDougall 认为,在澳大利亚,一国党“强调民族主义、保护主义、(Anglo)单一文化主义、反多元文化主义、反移民和拒绝多边主义的立场,对更为保守的联盟支持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在与一国党争夺这一要素的支持时,联盟党可能会对这一立场做出一些姿态”。^[40]Gaber 和 Tiffen 也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一种不稳定但往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41]“中国影响”话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媒体不愿意承认其党派偏见但是愿意去扮演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角色。前记者 Munro 将一系列有关“中国影响”的报道及记者列了一个名单,她称之为英雄谱。^[30]此外,民族主义,尤其是当涉及“中国威胁”的主题,不仅能够唤起记者的英雄主义情结而且对媒体来说更是寻求轰动效应的好机会。Goodman 的研究发现,“中国威胁”的概念本身就是对更广泛的轰动效应的一种吁

求。^[42]澳媒体在“中国影响”报道中的民族主义叙事或许正是出于对英雄主义情结与轰动效应的双重追求。

“中国影响”报道中的民族主义叙事是通过对中国进行“他者化”，建构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来实现的。Triandafyllidou 认为一个国家的身份是通过“有意义的他者”的影响来定义和重新定义的，这个“有意义的他者”即被认为对其独特性、真实性和独立性具有威胁性的其他国家或族裔群体。^[43]在该案例中，澳大利亚被建构为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多元文化的民主与人权超级大国，而中国被描述为一个与“此”相反的反民主的、民粹主义的、激进的威权主义“他者”，“他者”正在秘密地“影响”“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大学，甚至是民选代表的决定。通过对中国的他者化，媒体建构了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并将其运用到一系列报道之中。但显然，这个对立结构中的两端在价值上并不是平等的。

（二）报道框架对公众话语的影响

报道的内在结构导致了公共话语的失衡。在预设的二元对立框架下，正如一些评论者已经注意到的，“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辩论正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越来越难找到一个微妙的中间立场来讨论两国关系的复杂性、挑战和机遇”。^[44]因为媒体并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进行报道，话题本身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设置的，而这导致了整个公共话语的失衡。那些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人似乎拥有了话语霸权，他们将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称之为“间谍”或“双面间谍”，对那些与中国有关系的人以忠诚或背叛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在他们眼中，中国共产党员甚至中国共青团员都被认为是危险的，中国留学生与研究人员被视作被洗脑的或被控制的，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被认为可能为情报机构服务。实际上，即便存在中立的观点，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中，也很难得到承认。正如前外交官 Rigby 所观察到的，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两种共时性叙事：广泛的积极乐观的贸易、经济叙事和更关心国家安全的叙事，“在大多数情况下，两种叙事是相互平衡的，后者往往不如前者突出，而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平衡已经逆转了”。^[45]

（三）报道框架对公众认知的影响

内含着意识形态偏见的报道框架对公众认知正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说关于“中国影响”的官方话语只是表达了政治学意义上强调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话，媒体话语和公共话语则并未停止于此，而是滑向了极端种族民族主义，尤其是当媒体报道将“中国影响”与移民、房产、投资等关联在一起时。即便中国被建构为意识形态上具有威胁性的“他者”，对公众而言仍然是遥远的，但涉及移民、房产与投资问题，则关乎公众的切身利益，极易煽动种族主义与排外情绪。这也是为什么关于“中国影响”的报道如此迅速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并形成了激烈的辩论。洛伊研究院 2018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澳大利亚人中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允许来自中国的投资过多”的人口比例急剧上升，近四分之三（72%，高于 2014 年的 56%）持这一观点，另有 63% 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在澳大利亚政治进程中的影响表示担忧”。^[46]新闻报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更引发了现实的反应，Ang 与 Chey 指出这些报道加剧了对在澳华裔的不信任，反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事件显著增加。^[47-48]

六、结语

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影响”的报道表明，在涉及国际冲突的报道中，媒体倾向于与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在该案例中，媒体不仅没有独立地审查官方的观点和信息，而且在议程设置与消息来源的使用上保持与政府的密切互动，并试图通过报道去佐证官方的观点和信息，削弱或解构来自其他群体和其他国家的观点。该案例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 Bennett 关于媒体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倾向于让官方主导报道的结论。^[7]但与之前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媒体在“中国影响”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角色及其立场并非政治操纵的结果，也非因为屈服于信源的权威，而是媒体的自主选择。

澳大利亚媒体之所以选择与政府一致甚至更激进的立场，与媒体跳出国内媒介体制所规定的角

色并在国际关系中来定位自身有关。澳大利亚媒体在对“中国影响”的报道中,实际上把自身定位在了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角色,由此立场出发在报道中建构了一个非平衡的二元对立结构。基于这样的角色定位,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官方代言人自然成为媒体的盟友而非对立面。媒体依旧宣称其是公共利益的看门狗,只不过监督的对象由本国政府转向了他国。然而媒体与本国政府的关系并非单向的监督关系,而是相互的监督和制约,媒体与他国的关系却缺乏这种相互的制约,因此媒体对他国的报道更容易变得激进。这也表明,当媒体在对国际冲突进行报道时,无论媒体是否独立于本国的政党和政府,都难以超越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以中立的姿态平衡地组织报道。

澳大利亚媒体在涉华议题上表现得如此激进,还与意识形态偏见、民族主义思潮同其历史文化心理合流有关。西方媒体包括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一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在国内学者们关于西方媒体涉华议题的报道研究中均有所体现。通常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偏见表现得并不明显,往往隐藏在专业主义的叙事之下。^[49]但随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思潮的出现,媒体受众的分裂与媒体价值观的分裂同时发生:对内,媒体的党派偏见愈发明显,对外,媒体的意识形态偏见再度凸显。尽管澳大利亚保守派政府与政治倾向偏左的 ABC 之间多有相互指责,但在“中国影响”议题上,不同政治倾向的媒体都体现出了同样的立场,偏左的 ABC 与 Fairfax 更是联合推出了系列调查报告。在意识形态上,澳大利亚媒体除了一贯的偏见之外更表现出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倾向。在历史文化心理上,澳大利亚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认同上的割裂一直存在不安全感,自身又属于中等强国,任何在此区域内崛起的国家都被视为对手和威胁,之前是日本,现在是中国。这种不安全感与意识形态偏见、民族主义的合流导致了澳大利亚媒体在中国议题上尤其敏感。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尽管传播技术提供了可以抵达更广泛受众、接触更多样化信源的可能,反全球化的趋势却强化了媒体固有的偏见。Tiffen 所认为的全球化与传播技术发展将会改变国际冲突报道中的偏见与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似乎过于乐观了,因为媒体偏见不仅源于无知,还在于国家利益边界的难以跨越,当下的媒体偏见毋宁说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选择性偏见。

此外,在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以及公共辩论中,“中国影响”这一概念是以一种负面的方式被定义的,这样的定义有可能对公众认知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关于“中国影响”的舆论风暴不论持续多久,终究会过去,这一概念却会长久存在于人们的话语之中,如果没有充分地予以纠正,它有可能持续作为中澳关系的一个负面提醒存在,并唤起公众的负面想象。尽管有学者已经指出了相关报道中的事实错误,但报道留给公众的负面印象却很难抹去。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尽管开战之前专家已经指出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指控,但媒体高频的反复报道使得 69% 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与“9. 11 事件”相关,直至后战争时期各种混乱和漏洞被曝光,仍有 41% 的人继续相信。^[7]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影响”话语从事实与话语层面进行持续纠偏。

最后,本文作为案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其局限性,对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角色问题,仍需进一步对更多国家的媒体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或对某一国家的媒体进行长时段的纵向考察。

参考文献:

- [1] 史安斌. 以理念创新回击西方舆论战. 2018-03-12. [2019-01-28] <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8/0312/2258162.shtml>.
- [2] 吴飞. 流动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威胁论”的缘起与演变. 南京社会科学, 2015, 9: 7-16.
- [3] 苏珊珊. 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演变. 社会主义研究, 2019, 2: 140-147.
- [4] 张国玺, 谢韬. 澳大利亚近期反华风波及影响探析. 现代国际关系, 2018, 3: 26-34.
- [5] 朱文博. 整体趋好、曲折多变——澳大利亚媒体涉华舆论走向评析. 公共外交季刊, 2017, 2: 118-125.
- [6] D. C. Hallin, P. Mancini.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8.
- [7] W. L.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Glenview: Pearson Education, 2012: 120; 118; 14, 87.

- [8] R. Tiffen. *Conflicts in the News: Publicity Interests, Public Images and Political Impacts*// H. Tumber. *Media Power, Professionals and Polic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201-202.
- [9] 东尼·凯伊. 澳大利亚媒体产业概况. *对外传播*, 2010, 3: 60-61.
- [10] M. Turnbull. *Speech Introduc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Bill*. 2017-12-07. [2018-11-03] <https://parlinfo.aph.gov.au/parlInfo/search/display/display.w3p;query=Id%22chamber/hansardr/716f5e71-dee3-40a3-9385-653e048de81b/0193%22>.
- [11] C. Uhlmann, C. Gribbin. *Malcolm Turnbull Orders Inquiry Following Revelations ASIO Warned Parties about Chinese Donations*. 2017-06-06. [2018-11-03]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06-06/turnbull-orders-inquiry-following-revelation-asio-warned-parties/8592308>.
- [12] ABC. *Power and Influence*. 2017-06-05. [2018-11-03] <https://www.abc.net.au/4corners/power-and-influence-promo/8579844>.
- [13] M. Turnbull. *Keynote Address at the 16th IISS Asia Security Summit*. 2017-06-03. [2018-11-03] <https://www.malcolmturnbull.com.au/media/keynote-address-at-the-16th-iiss-asia-security-summit-shangri-la-dialogue>.
- [14] C. Byrne. *Issues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July to December 2017*.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2018, 64 (2) : 293-311.
- [15] M. Head. *Australia's Anti-democratic "Foreign Interference" Bills*. *Alternative Law Journal*, 2018, 43 (3) : 160-165.
- [16] M. Brissenden. *Dastyari "in the Pay of a Foreign Entity"*, Says Brandis. 2016-09-06. [2018-11-03] <http://www.abc.net.au/am/content/2016/s4533379.htm>.
- [17] J. Massola, F. Hunter, P. Wen. *Donations Scandal Deepen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6-09-06. [2018-08-16]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1816643454?accountid=36155>.
- [18] N. McKenzie, C. Uhlmann, R. Baker, et al. *ASIO Investigation Targets Communist Party Links to Australian Political System*. 2017-06-05. [2018-11-03]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06-05/asio-china-spy-raid/8589094>.
- [19] N. McKenzie, A. Grigg. *Rudd, Donor in China Meeting*. *The Age*, 2018-05-25 (1) .
- [20] S. Dziedzic. *Government Needs to Be 'Very Conscious'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SIO Says*. 2017-10-25. [2018-11-03]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10-25/government-very-conscious-foreign-interference-australian-unis/9082948>.
- [21] A. Greene, S. Dziedzic. *China's Soft Power: Julie Bishop Steps up Warning to University Students on Communist Party Rhetoric*. 2017-10-16. [2018-11-03]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10-16/bishop-steps-up-warning-to-chinese-university-students/9053512>.
- [22] P. Maley, N. Berkovic. *Security Agencies Flag Manchurian Candidates*. 2017-12-09. [2018-11-03]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security-agencies-flag-chinese-manchurian-candidates/news-story/81e6dad4b472180141f543d2f08e3e25>.
- [23] N. McKenzie, J. Massola, Andrew Robb's *Secret China Contract: Money for Nothing*. 2017-12-05. [2018-11-03] <https://www.brisbanetimes.com.au/politics/federal/andrew-robbs-secret-china-contract-money-for-nothing-20171205-gzzaq5.html>.
- [24] N. McKenzie, R. Baker, P. Coorey. *Sam Dastyari's South China Sea Comments Exposed on Tape*. 2017-11-29. [2018-08-12] <https://www.afr.com/news/sam-dastyaris-south-china-sea-comments-exposed-on-tape-20171129-gzv57l>.
- [25] J. Hatcher. *Unnamed and Anonymous Sources: Did They Shape the Debate over Invading Iraq?* *Global Media Journal*, 2010, (10) . [2018-11-03] <https://search-proquest-com.ezproxy.uws.edu.au/docview/850705845?accountid=36155>.
- [26] A. Clennell. *NSW Labor Leader Luke Foley Hits out at Fairfax over Reports on MP Ernest Wong and Chinese Australians*. 2018-06-28. [2018-11-03]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state-politics/nsw-labor-leader-luke-foley-hits-out-at-fairfax-over-reports-on-mp-ernest-wong-and-chinese-australians/news-story/9d2da71ff6559e4c823326aa55c6e20d>.
- [27] J. Laurenceson. *Do the Claims Stack up? Australia Talks China*. Sydne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18-10-29. [2018-11-25] <https://www.australiachinarelations.org/content/do-claims-stack-australia-talks-china>.

- [28] S. Humphreys, M. de Zwart. Data Retention, Journalist Freedoms and Whistleblower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2017, 165 (1): 103-116.
- [29] W. L. Bennett, W. Serrin. *The Watchdog Role of the Press* // D. Graber. *Media Power in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 CQ Press, 2011: 396-397.
- [30] K. Munro. A Free Press Is a Magic Weapon Against China's Influence Peddling. 2017-12-28. [2018-07-2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free-press-magic-weapon-against-china-influence-peddling>.
- [31] N. McKenzie, C. Uhlmann, R. Baker, et al. Australian Sovereignty under Threat from Influence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2017-06-04. [2018-11-03]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06-04/australian-sovereignty-under-threat-from-chinese-influence/8583832>.
- [32] N. McKenzie, S. Nicholls. Chinese Influence Enters State Parliament.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7-07-19. [2018-11-03] https://global.factiva.com/ha/default.aspx#!?&_suid=1543887849877037078066620440825.
- [33] C. Stewart. China "Seeks to Tilt Our Political Landscape to Its Advantage". *The Australian*, 2018-03-22. [2018-11-03]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world/china-seeks-to-tilt-our-political-landscape-to-its-advantage/news-story/2335af166e55e356cb971663db2b13>.
- [34] C. Mitchell. Debate on China Produces Strange Bedfellows among Members of Commentariat. *The Australian*, 2018-06-11. [2018-11-03] https://global-factiva-com.ezproxy.uws.edu.au/ha/default.aspx#!?&_suid=154339509451203592995053061486.
- [35] W. Sun. PM Morrison's Strange Speech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A Selective Charm Offensive? 2018-10-12. [2018-12-28] <https://johnmenadue.com/wanning-sun-pm-morrison-strange-speech-to-china-and-the-chinese-a-selective-charm-offensive/>.
- [36] C. Uhlmann. Here are Some Facts Bob Carr Forgot to Mention. *The Australian*, 2017-06-12. [2018-11-03] https://global.factiva.com/ha/default.aspx#!?&_suid=154389001655009159609926885081.
- [37] S. Fitzgerald. Managing Ourselves in a Chinese World: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Disruption. 2017-10-04. [2018-07-28] <https://www.whitlam.org/publications/2017/10/4/managing-ourselves-in-a-chinese-world-australian-foreign-policy-in-an-age-of-disruption>.
- [38] ABC. China Slams Malcolm Turnbull's "Hysterical, Racist Paranoia". 2017-12-12. [2018-11-03]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12-12/china-slams-australia-hysterical-racist-paranoia/9248950>.
- [39] A. Gyngell.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Does the Public Matter? Should the Community Ca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72 (2): 85-91.
- [40] D. McDougall. Australia's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que. *The Round Table*, 2018, 108 (3): 279-290.
- [41] I. Gaber, R. Tiffen. Politics and the Media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2018, 167 (1): 27-40.
- [42] D. S. G. Goodman. Australia and the China Threat: Managing Ambiguity. *The Pacific Review*, 2017, 30 (5): 769-782.
- [43] A. Triandafyllidou.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8, 21 (4): 593-612.
- [44] N. Bisley, J. Leibold. Stop Spiral of Rhetoric on China,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2017-12-02 (46).
- [45] A. Clark. Bipartisan Approach to China Eroding.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2017-11-06. [2018-11-03] <https://www.afr.com/news/politics/world/australias-bipartisan-approach-to-china-eroding-warns-former-diplomat-20171105-gzf3m3>.
- [46] A. Oliver. Lowy Institute Poll (2018). 2018-06-20. [2018-08-2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2018-lowy-institute-poll>.
- [47] I. Ang. Engaging Australia's Chinese Diaspora. *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 2017, 9 (4): 38-39.
- [48] J. Chey. China Watchers Are Not China Stooges. 2018-04-06. [2018-08-28] <https://johnmenadue.com/jocelyn-chey-china-watchers-are-not-china-stooges/>.
- [49] 汤志伟,王宇明.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方式与价值偏见——以《纽约时报》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报道为例. *理论与改革*, 2013, 3: 46-50.

The Role of Australian Media in the Coverage of "China Influence"

Zhang Guifa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acing the rise of China, "China threat theory" has emerged again in Western society. The Australian version of this is "China influence" discourse. An analysis of Australian media's coverage of China's influence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Australian media claimed to be independent from government and parties, they did not fulfill their role as watchdog in their reports on China's influence. They kept closing inter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in agenda setting and sources, while weakening or deconstructing views from opposing groups and countries. They also did not examine the opinions and information from official sources but tried to defend and confirm them through reports. Compared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attitude of the media was even more radical. Under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binary opposition, the media have positioned their role as the defender of national interest, but this role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fferent and dangerous "other". The frame in Australian media's coverage of China's influence, not only caused heated debate but also affected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debates and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China. The more concerned national security narrative overwhelmed the optimistic trade and economic narrative and dominated public discourse. Othering China and Chinese made public perception negative. This paper further argues that, whether the media is independent or not in the national media system, it is inevitable for them to reposition their role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n addition, this case challenges the previous view that globa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ill change bias in international coverage, because the bias stems from the independent choice of the media rather than ignorance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Australian media; China influence; watchdog role;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media bias

■ 收稿日期: 2019-06-23

■ 作者单位: 张桂芳, 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 济南 250014

■ 责任编辑: 汪晓清